

王国维评传

王 文 生

王国维的青少年时代

王国维，初名德楨，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元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内双仁巷王宅，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公元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之昆明湖。

王国维的先世原籍开封。远祖王稟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副都总管抗金守太原，城破殉难，被追谥为忠壮公，赠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由青州随宋高宗南渡，迁至海宁，后来就世代定居在这里。王国维的高祖王建臣，祖父王嗣铎都是清代的国学生，父亲王乃誉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弃儒经商，但仍保存着对诗文书画篆刻的爱好，曾在这些方面给王国维以影响。王国维的母亲凌氏在他刚满四岁时就去世了。童年的王国维是由祖姑母、叔祖母抚养的。

关于王国维的家庭和他少年时代的求学情况，他自己有过一段概括的自述：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所储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贖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①

王国维少年时期，完全是受的旧式教育。他从七岁开始，到距家附近的潘绶昌先生处上私塾，读的是传统的十三经。但是，他对于这类旧学并无兴趣，常常读些塾师规定以外的书籍。到十一岁那年，他转到当地的陈寿田先生处读书。恰恰他祖父在这年死了。父亲从溧阳游幕回来，从此不再外出，日以课子自娱。王国维白天到私塾读书，夜晚则从父亲学习骈文、散文、及古今体诗，并自习金石书画。他在十五岁时，与同乡褚嘉猷、叶宜春、陈宗谦订交，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据陈宗谦在《王忠愍公哀挽录》中的回忆，这时王国维的才华已开始显露出来，他们被称为海宁四才子，而又以王国维为第一。他们在一起，“辄上下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对文史校勘的兴趣在这时已开始形成。这种趣向到王国维十六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时就更加发展了。他到那里去本来是为了接受科举考试训练的，而结果却是对史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看到友人读《汉书》很有兴趣，就把幼时储蓄的岁朝钱买了“前四史”来读，并认为这才是他真正的“读书之始”。由于对史学的兴趣压倒了对科举的准备，王国维于一八九四年第一次应举不中。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起，清朝的海军被日军战败。满清的政治腐败和国势凌弱一下子暴露在民众面前，它引起许多人要求变法自强，也使得王国维知道世上有一种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新学”。他曾经作过游学的打算，但以无钱外出而作罢。甲午战争的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和约订立。康有为联合各省入京会试的新进士上书光绪，要求变法维新。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时务报》，也鼓吹变法。梁启超公开要求废科举，兴学校，给予全国很大的影响，也使得王国维对科举更加缺乏兴趣。他在第二年再次应举不中之后，也就决定“弃帖括而不为，绝举业而不就”，从此走向另一条学习

的道路。

王国维的家庭并不富有，他在先一年又已结婚成家，再次应试失败之后，他就同乡沈冠英家当塾师以维持家计。一八九八年初，他经同学许默斋的介绍，到汪康年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当书记。二十二岁的王国维从故乡海宁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来到上海时，正当戊戌政变的酝酿期，他工作所在的《时务报》又是主张变法的舆论中心之一，这种客观环境更激起他向往“新学”的愿望。当时，许多人都向西方寻找富国强兵的道理，而罗振玉则主张向日本学习，“以御西力之东渐”^②。他以私资设立东文学社于上海，聘请日本人以日文教授科学。王国维征得汪康年的同意，以每日下午参加东文学社学习，其它时间用于报馆工作，成为该社最早的六名学生之一。王国维虽然得到学习机会，但除了听课之外，几乎没有自修的时间，学习成绩远不如其他同学，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罗振玉最初还不认识王国维，后来在一个同学的扇面上读到写的咏史诗，特别欣赏其末联：“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遂认为他将来定是一个特异的人才，决定资助他赡养家庭，使他能专心致力于学习。然而不久之后，就在这年（公元1898年）八月，发生了戊戌政变。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支持变法的《时务报》也随停办。王国维因此失去了工作，罗振玉请他兼任东文学社的庶务，并参加编译由罗主办的《农学报》。王国维与罗振玉结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时的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人为教师。他们都是研究哲学的。田冈早年有悲观厌世思想，尤其醉心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他们的兴趣大大启迪了年青的王国维。据《静安文集续集·自序》称：“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现译为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他为了克服学习西方哲学的障碍，决心学习英文。据《自序》说：“余之学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

一九〇〇年夏天，发生了著名的义和团起义，接着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上海震动，东文学社也因而解散。罗振玉在秋后应湖北总督张之洞之约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监督，继而在第二年初请王国维前往担任译述讲义的工作。据罗振玉《集蓼编》的回忆：“当在鄂时，无所事事，王、樊（炳清）两君除讲译外，亦多暇日，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杂志。”他在这年四月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于上海，请二十五岁的王国维担任主编。既而在这年秋天又资助王国维以旅费，使他留学日本。王国维经东文学社时期的老师藤田丰八的介绍，到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并接受藤田丰八的建议专修理科，白天学习英文，夜间到物理学校学习数学。他在物理学校颇以学习几何为苦，几个月后，脚气病又大为发作。刚好第二年（1902年）春天，罗振玉再次受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校，罗遂劝他回国。王国维留学日本不到一年，于一九〇二年夏天回到上海，从此开始了独立学习和从事著述的新时期。

王国维的中年及其文学活动

王国维的文学活动集中于二十六岁（公元1902年）至三十五岁（公元1911年）的不到十年之间。按其活动性质来说，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02年——1906年，以写作有关文学和美学的杂文为主；二、1906年——1907年，寄情于词的创作；三、1908年——1911年，从事于词的理论研究和撰写《宋元戏曲史》的准备工作。

一、王国维的早期杂文

王国维从日本返国后，他的思想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原来，他虽对哲学有些兴趣，但在

当时社会思潮影响下，仍有志于“富国强兵”的理科学问。从此以后，他却转向于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索，专心致力于哲学的研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曾谈到他归国后的思想情况：“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惰，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舌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回国之初，在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执事，兼为罗振玉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一九〇三年春，又应南通张謇之聘到新创的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他在授课之外，兼习哲学概论及西方哲学史。并开始读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然苦于难解，转而读叔本华的书，乃发生极大的兴趣。一九〇四年秋，罗振玉创江苏师院于苏州，请王国维自南通到该校任教，主讲心理、伦理、社会学的课程。这时藤田丰八也应聘到校。王国维乃不时向他请教，继续学习叔本华哲学，并进一步学习康德哲学。《静安文集·自序》云：“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辛丑，公元1901年）、壬（壬寅，公元1902年）之间，癸卯（公元1903年）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判，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公元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王国维还在康德、叔本华思想影响下，写出了一批关于文学及其它方面的杂文，刊载于《教育世界》杂志上。一九〇五年，又将这些文章及古今体诗五十首结成《静安文集》。

王国维的第一期文学论著，见于《静安文集》中的，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教育偶感》、《论教育之宗旨》等文。至于一九〇五年后两三年间写成的则有：《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表后》、《去毒篇》等文。这些文章于一九三六年被后人收入《静安文集续编》中。

把王国维在早期杂文中的文学思想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点。第一是超功利的文学观。他是从文学的起源入手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速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③

王国维这段话的中心即文学起源于游戏。可以从西方美学中找到它的渊源。康德早已指出，艺术和游戏类似。席勒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斯宾塞则从生理学观点解释席勒所谓精力过剩发为自由活动的说法。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都得出了艺术和游戏是不带任何实用目的自由活动的结论。因此，作家在创作中不能怀有功利的目的，读者也不应对文艺提出任何带有功利的要求。王国维据此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能。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铺缀的文学，决非文学也。”④又说：“……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⑤他从超功利的文学观出发，对传统的文学观进行批评，反对文学投合社会政治之兴味，反对文学服务于善恶

扬善的目的，也就十分自然地认为，只有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王国维反对把文学与任何其它目的联系起来，那末，什么才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呢？他从文学内容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文学小言》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言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也。”这里所谓不能以“他道劝”，也就是不能用其它的手段或目的来对它进行干预。他所要求于文学的，从主观来说，则是感情的自然真实的流露；从客观来说，则是“自然及人生之事实”的真实的描写。“情真”“景真”，构成他所谓“纯文学”的标志，也就是他心目中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的标准。而在二者之间，“情真”尤其重要。“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⑥，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什么是“感情真”呢？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也就是“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⑦，表现自己的“人格”。他甚至认为，这种主观的“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比起反功利反欲念来说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他在《文学小言》中又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在王国维看来，高尚伟大之人格的实践并不是建功立业，而是“真”。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的伟大处也就在这里。尽管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曾从反功利出发，以否定的态度谈到杜甫所怀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在这里，仍然肯定杜甫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作家。这主要是因为，杜甫是在思想上真正怀抱这种理想，并不是伪托忠诚以博取名义的。又如他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⑧这里引用的两组诗句，前者表现了明显的欲念，后者表现了明显的功利，但王国维却以其“真”而对它作了肯定。由此可见，文学的“真”，是他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它虽是从他的超功利的文学观引申而来，却又突破了他的超功利的文学观的范围。

第二，与他的超功利的文学观相联系的，是他的超利害之直观的美学观念。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接受了人生观和美学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他认为支配着人生的一切，驱使着人们行动和认识的，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欲”（Will或译为意欲）。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感到各种各样的缺乏，缺乏即是痛苦。然后因缺乏而产生需要，因需要而产生意欲。当一种意欲得到满足时，另一种更大的意欲随之而生，意欲不断上升，满足永无止境。人生象是填不满的欲壑，也就充满着永无止境的痛苦。“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⑨。

“欲”既是生活的本质，则人的一切无不与“欲”发生关系。人的身体器官无不为“欲”而设；人的思想无不为“欲”而动，人的感情无不为“欲”而生，人的认识和行动无不受着“欲”的支配。因此，“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⑩。也就是说，人们所考虑的，只是那些与现实生活发生利害关系的事物；人们认识事物，也不过是以趋利避害为旨归。

人的认识和实践，无不与“意欲”相关，也就总是与痛苦相关。人们要想获得“解脱”，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消除一切欲念，绝对地忘却自我。除此之外，只能有一种暂时的“解脱”。这种暂时的“解脱”，便是艺术。王国维说：“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名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艺术为什么能使人获得解脱呢？其原因在于艺术创造艺术欣赏过程中，人们观赏的对象

和心理活动与一般情况是不同的。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美学把它概括为二句话：“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The Knowledge of idea)”^⑪；“美术之知识全是直观之知识”^⑫。前者说明的是审美对象；后者说明的是审美方式。换句话说，前者说明，只有实念(现译理念)才能引起人们的审美经验；后者说明，“直观”是人们在审美经验中的心理活动方式。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实念”究竟是什么？按照叔本华的意思，即是物自身的真象。举例来说，我们在各种场合里见到不同形式的桌子，它们是有形的实体，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但在叔本华看来，这些不同的桌子并非真实的存在，它们不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人们的需要而被设计成各种形状的。它们将要腐烂而最后归于无形。与其称它们为实有，不如称它们为“非有”(non-being)。而桌子之真正存在不是有形的桌子，而是那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的“实念”(Idea 或译理念)。这种“实念”，便是审美的对象。各种具体桌子由于分享实念的多少不同而呈现不同程度的美。人们只有通过对具体桌子的形式，撇开它的实用价值，因果联系，而观照那与人们无利害关系的桌子的实念，才能成为美感经验。

生活中的实物既然都和人发生利害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这就需要运用一种审美直观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叔本华在他的《意欲世界与理念世界》中说得很详细。大意是，一个人在进行审美直观时，要丢掉寻常的看待事物的方法。他不应考虑具体的实物处于何时、何地；它是由什么因素所构成；对人有什么用处和害处；而只是对物的本身作专心的观照，把全副精神专注在所觉物上面，把自己沉没在所觉物里面，使自己溶入这所觉物之中，以致“物”与“我”泯灭了界限而溶为一体。这时，观物的“我”已是一个无意欲、无痛苦的“纯粹主体”(The Pure Subject)；我观之“物”，也不是与利害相联系的具体的物，而是物的“理念”。

按照叔本华的方法，在审美直观中，主体和对象都与利害、意欲绝缘，所以它能使人摆脱名缰利锁，“忘却营营”，获得暂时的和平和解脱。而艺术的价值也就在这里。王国维说：“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王国维不仅在早期杂文中宣扬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而且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文学作品的《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王国维牵强附会地说，贾宝玉的“玉”，“不过生活中之欲之代表而已矣”；而贾宝玉的出家，则是拒绝生活之欲的根本“解脱”。《红楼梦》全书之精神，就在于指出“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知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也”^⑬。从审美范畴说，王国维又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它揭示那些与生活之欲相关系的人物，无不与痛苦相终始。而这种痛苦不是由极恶之人所造成，不是因为盲目的命运的支配，而是由于“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⑭。也就是说，它是由普通人所具有的寻常的欲念所造成的。唯其普通而寻常，才使人感到其痛苦“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其酷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才更加显得惊心而动魄。

王国维以“灭绝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作为《红楼梦》的主旨，这与原书通过贾府的盛衰反映了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并从客观上揭示其必然没落的趋势是迥然异趣的。他把人的痛苦的根源归结为自己的欲念，而不是归之于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及其复杂的社会因素。这无异于从实际上阉割了《红楼梦》所具有的反封建意义，为统治阶级的罪恶统治和残酷剥削进行辩护和掩饰。

总的说来，王国维的早期文学理论批评杂文，写于他耽读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的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叔本华的超功利的文学观、超利害的直观的美学思想，以及把上述观

点应用于文学批评。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是帝国主义垂危时期的社会动荡、个人自我扩张和欲念猖獗的反映。他在“人欲横流”“生存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宣扬什么“超功利”“超利害”，无异于要求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蒙住自己的眼睛去听任宰割。这不是解脱人类痛苦的药方，倒是保存人类痛苦根源的妙计。即使在王国维还迷信叔本华的时候，他已发现了叔本华学说所存在的根本矛盾。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

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应译为意欲）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份，而其大部份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这就是说，叔本华既然认为意欲是人生的本质，则“意欲”应为人人之所共有。如果按照叔本华的说法，“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则强者必为“意欲”所驱使，而把痛苦强加于弱者。由此可见，叔本华的超利害的美学，不过是弱肉强食的美学，它不过是使强者获得更大的利，弱者受到更大的害而已。他的思想后来竟成了德国法西斯暴行的理论基础，就充分暴露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

至于王国维所宣传的超功利的文学观，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也不过是心造的幻影。王国维曾经说过：“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的结果。”则作家既然借文学来表现一己之情一己之认识经验，他就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而发。当这种文学传之于社会播之于人群时，也就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鲁迅曾经在《文艺与革命》中说过，“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他的话清楚地说明了文学的超功利是绝不可能的。

把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并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古代文学批评，是王国维早期有关文学杂文的基本内容。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杂文进行总的评价，则不难看出，其中不乏合理的因素，如由“理念”出发，而引伸到对文学的典型性、概括性的注意；从“超功利”而引到对文学的真实性的强调；由“重抒发一己之感情”而要求以一己之感情传达人类普遍之感情，通过一人之痛苦而表现人人之痛苦等等；但总的说来，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失误多于成功的。尽管如此，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探索仍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它反映了当时封建锁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潮流。当二十世纪刚刚开头的时候，王国维第一个把西方美学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批评并力图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开启一代风气的作用，它对于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有着深刻的影响。至于他的失败的教训，至今也还是值得我们深深吸取的。

二、《人间词》的创作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王国维年届三十，他正处在对叔本华的哲学发生怀疑，而对填词感到兴趣的时候。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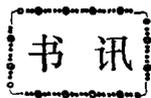
正当他心情矛盾兴趣转变的时候，罗振玉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充学部参事，举家北上，也邀王国维一起同行。王国维于一九〇六年正月到达北京。后来，又由罗振玉推荐，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到学部供职，充图书局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

在这期间，王国维迭遭家庭变故。一九〇六年七月，父乃誉病卒于家；一九〇七年六月，夫人莫氏病故；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继母叶氏逝世。他把自己的悲痛感情寄托于词的创作，先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把过去二三年所填词汇集为《人间词甲稿》；后又在一九〇七年十月把一年来所为词汇集为《人间词乙稿》。甲、乙两稿都附有王国维托名樊志厚写的序。王国维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以“人间”名其词集，与《人间词》一百一十五阙，“人间”二字凡三十八见有关；与他当时自称“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与他对人生的不断探索有关。王国维在晚年易《人间词》为《苕华词》，则取《诗》序称《诗·小雅·苕之华》为“大夫闵时”之作的意义，或有感于清室衰亡而发。其实，现存“人间词”的大多数，总共一百一十五阙中的九十二阙都成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之间，作者当时并无“伤时”之意，而多为“忧生”“忧世”之作。

王国维的词具有许多特点，首先即在于意境的独创。《人间词乙稿序》云：“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说明了他的词的创作的着力处。他认为意境的创造在于“观物之微，托兴之深”，以及“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他的词是实践了这些原则的。以《浣溪沙》“天末同云”为例：“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羹。今朝欢宴胜平时。”这里没有堆字砌句，而是以素描的手法描绘出真实的景象，寄寓深切的感情。前片开头一句“天末同云黯四垂”仅寥寥几字就写出了环境的凄绝；次句“失行孤雁逆风飞”写出了“他”的悲苦挣扎；第三句“江湖寥落尔安归”更写出这种挣扎近于绝望而归于茫然。后片“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羹。”写出了人间险恶，危机四伏和“他”的最后的归宿。尾句“今朝欢宴胜平时”，更用强者的欢笑、弱者的悲苦作强烈对比而加深了对生存竞争社会的形象的描写。整首词写情写景“语语都在目前”而又“托兴深远”，使人通过逼真的形象而获致一种深远的意境，即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人间社会里的弱者的挣扎和悲苦的情景。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⑮。又说，“静安之词……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⑯。由此可见，致力于意境的创造和意境的深远是他的词的最基本的特点。

《人间词》的另一特色，即在于“通古今而观之”^⑰。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一个广阔的时间空间里来认识事物的深刻意义，因而具有普遍的哲理性。如《鹊桥仙》“沈沈戍鼓”：“沈沈戍鼓，萧萧戍马，起视霜华满地。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夕邮亭天气。北征车辙，南征归梦，知是调停无计。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这首词写人在旅途中的感触。前半阙从写实而引起回忆。后半阙写人事匆匆世事茫茫，由“北征车辙，南征归梦”，归结到“知是调停无计”，说明一切都难以预料，一切都不可捉摸。他不是一般地写异乡情、羁旅思，而是最后引出“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说明人生如过客，一切都不由自主，一切都虚妄无常，从而透露出整个怀疑主义和宿命论的人生观。

《人间词》的第三个特点则是它的悲观主义色彩。王国维从小具有忧郁的性格，后来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他所推崇的五代北宋词中，又特别喜欢李煜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人类罪恶之意”^⑱。他的性格，他所接受的哲学、文学传统的影响，都使他的词具有无可奈何的悲天悯人的色彩。以他自己十分欣赏的《蝶恋花》“百尺朱楼”为例：“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在这首词里，他把人的一生作了几个阶段的描写。“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以一己处在人生痛苦的轮回中而不自觉，只知“闲中数尽行人小”，而不知自己也是“行人”之一。第二阶段，“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从“一霎”而到“老”，说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⑲写出时间



《美国现代史丛书》 开始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分册出版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日益成为世界强国，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的霸主地位虽开始动摇，但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至今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美国现代史，或者说，研究美国帝国主义史，对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入手，进一步发现和认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美国史研究方面虽然作出很大成绩，把它基本上纳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但还是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于美国史的研究，还留下许多空白。直到现在为止，我国出版的关于美国的正规历史著作，包括译著在内，都没有写在一九六〇年。因此，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不独一般人印象模糊，就是学习美国史的人，有的也知之不深，尤其对于美国进入帝国主义已八十余年仍然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这一点，难以解释清楚。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违反历史教学和研究的

厚今薄古原则的。我校刘绪贻教授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现象而作出的初步努力。丛书将尽可能包括近几年来我校美国史研究室和国内史学界在美国现代史研究方面已经和将要取得的主要成果，要求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不钻牛角尖、不从事繁琐考证，要做到深入浅出，不独适合史学工作者，也适合一般读者学习美国现代史的需要。

美国现代史丛书分为两部分：一八九八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选题包括内政、外交、人民运动、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为适应当前急需，拟尽先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年内首先出版的是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韩铁同志撰写的《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南京大学时殷宏同志撰写的《尼克松主义》不久也将付印。此外，在近期内还将陆续分册出版《战后美国史学》、《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战后美国工人运动》、《新政以来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六十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麦卡锡主义》等书。

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将对美国现代史的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

(舒 性)

的无情和人生的飘忽。第三阶段，“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最后则是在西风苦雨中，自伤潦倒的一生。这里写的不是一时一己之感，而是王国维所认为的永恒不尽的人生悲苦，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此恨绵绵无尽期”之意。

(待 续)

注释：

- ①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 ② 罗振玉《集蓼编》。
- ③④⑥⑦ 《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 ⑤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 ⑧⑩⑫ 王国维《人间词话》。
- ⑨⑬⑭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 ⑪ 王国维《叔本华之美学》。
- ⑬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 ⑮⑯ 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
- ⑰ 王国维《蝶恋花·阅尽天涯》。